

中国社会调查报告

R

CHINA SOCIAL RESEARCH REPORT

中国都市社会脉动
上海调查 (2017)

Social Pulse of Chinese Metropolis

Shanghai Survey (2017)

孙秀林 等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 国

查 报 告

CHINA SOCIAL RESEARCH REPORT

中国都市社会脉动 上海调查 (2017)

Social Pulse of Chinese Metropolis

Shanghai Survey (2017)

孙秀林 等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都市社会脉动：上海调查：2017 / 孙秀林等

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5

ISBN 978 - 7 - 5201 - 2419 - 5

I. ①中… II. ①孙… III. ①社区 - 社会调查 - 上海
- 2017 IV. ①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7936 号

中国都市社会脉动

——上海调查(2017)

著 者 / 孙秀林 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杨桂凤

责任编辑 / 杨桂凤 杨鑫磊 等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学出版中心 (010) 59367159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4.25 字 数：406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2419 - 5

定 价 / 10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的出版得到上海大学高水平大学建设项目资助

出版者的话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

习近平，2013年7月23日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对于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步，获得了丰硕成果，对于民众、决策层、学者从多个角度了解国情、制定政策、发展学术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但必须看到，当代中国发生的巨变是结构性、整体性、全方位、多层面、多纵深的，再加上国际形势和全球化趋势的深刻影响，数字化和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结构、产业运行、组织机制、日常生活、群体身份、文化认同等方面都正在发生巨大变迁，这增加了认知的难度。

在这一背景下，重拾调查研究，对于我们深刻准确地了解国情无疑是一条重要的渠道。在诸种调查研究中，基于学术和学科的专题调查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能够提供对某个问题较为透彻、深入的理解，是把握国情的重要保障。有鉴于此，从2018年起，我们开始推出“中国社会调查报告”系列。

“中国社会调查报告”是面向整个社会科学界征稿的开放性系列图书，分主题定期或不定期连续出版。每部报告的出版都需经过严格的专家评审、专业的编辑审稿，并辅以定制式的学术传播，其目标是促进调查报告的社会影响、学术影响和市场影响的最大化。

报告的生产应立基专业学术，强调学理性，源于专业群体的专门调研，是学界同人合作研创成果。

报告应拥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科学严谨的方法、专业深度的分析、完善的内容体系，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

每部报告均面向边界清晰的调研对象，全面深入展现该对象的整体特征和局部特征。

报告的写作应基于来源统一的数据，数据的收集、分析、呈现遵循相应规范。数据既可以是定量的，也可以是定性的，可以通过问卷、参与观察、访谈等方式获得。

报告应提供相应结论，结论既可以呈现事实，也可以提供理解框架，还可以提供相应建议。

报告应按照章节式体例编排。内容应包括三部分，一是交代调查问题、调查对象和调查背景，二是交代调查方法、调查过程、数据获得方式、调查资助来源，三是分主题呈现调查结果。

报告应具有充分的证据性和清晰性，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结果和结论的正确性，报告的写作应清晰、一目了然，前后具有明确一致的逻辑。

报告应提供一个内容摘要，便于读者在不阅读整个报告的情况下掌握其主要内容。

“中国社会调查报告”将按照每部报告的篇幅分为两个系列，一为小报告系列，二为常规报告系列。前者为10万字以下的报告，后者为10万字以上甚至三五十万字的报告。

希望“中国社会调查报告”能为理解变动的世界提供另一扇窗口，打开另一个视界。借着这些调研成果，我们可以建设更美好的社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学出版中心

2018年1月29日

目 录

第一章 项目介绍	1
一 引言	1
二 街区效应的研究综述	3
三 中国的街区效应研究	6
四 上海都市社区调查	9
五 章节安排	14
第二章 抽样设计	15
一 抽样设计	15
二 样本代表性	18
三 小结	25
第三章 劳动就业	26
一 经济活动人口	26
二 就业类型	32
三 工作时间	40
四 工资差距	45
五 小结	50
第四章 城市住房	52
一 住房与产权	53
二 住房支出	65

三	居住迁移	70
四	小结	75
第五章	家庭生活	77
一	家务劳动和分工	79
二	家庭决策	83
三	育儿意愿	90
四	生活态度	92
五	小结	100
第六章	婚姻匹配	103
一	婚姻匹配	104
二	婚姻匹配与家庭事务决策	109
三	婚姻匹配与家庭生育	113
四	小结	116
第七章	生活与健康	118
一	生活方式	119
二	健康状况	125
三	精神健康与抑郁	131
四	小结	133
第八章	满意度	135
一	生活满意度	135
二	住房满意度	143
三	社区满意度	147
四	小结	150
第九章	高学历人才	153
一	基本情况	154
二	工作特征	158

三	收入情况	162
四	生活情况	164
五	离沪意愿	168
六	小结	169
第十章	在沪移民	172
一	基本结构	173
二	人口学特征	178
三	迁移特征	184
四	在沪身份	189
五	小结	194
第十一章	移民的社会态度	196
一	群体认同	197
二	社会融入	202
三	主观态度	207
四	小结	212
第十二章	老年人	214
一	基本情况	215
二	收入情况	216
三	健康状况	219
四	健康与医疗	227
五	照料与养老	230
六	居住满意度	232
七	社会支持与社会参与	234
八	小结	237
第十三章	儿童养育	239
一	上海儿童的结构特征	239
二	婴幼儿抚育和照顾安排	242

三 亲子互动和管教方式	245
四 教育期望与教育投入	251
五 小结	258
第十四章 儿童健康	260
一 健康状况	260
二 医疗状况	263
三 留守儿童状况	265
四 小结	268
第十五章 小区公共资金	270
一 维修基金和公共收益	270
二 存在的问题	274
三 政策建议	279
第十六章 小区公共设施	282
一 无障碍设施的分布	284
二 无障碍设施的通用性	286
三 无障碍设施的使用情况	292
四 小结	299
第十七章 社区参与	302
一 邻里交往	302
二 与居委会的关系	311
三 社区公共参与	318
四 小结	324
第十八章 社区治理	326
一 分析维度	326
二 因子分析	333
三 影响因素	335
四 小结	339

第十九章 社会组织	341
一 基本信息	341
二 内部治理结构	348
三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	352
四 社会治理功能现状	356
五 社会组织的认知	360
六 小结	365
参考文献	368

第一章 项目介绍

一 引言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特别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均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迁。随着户籍制度的放松和城乡与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人口流动数量特别是跨地区的流动快速增长。以 2000 ~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为例，跨乡镇的移民人口规模从 2000 年的 144390748 人增长至 2010 年的 260937942 人，增长幅度高达 80.72%。其中跨县市迁移为迁移人口的主流，2000 年占有所有迁移人口的 83.9% (29.4% 省际迁移)，2010 年占有所有迁移人口的 98.3% (32.9% 的省际迁移)。这些人口迁移，又是以从内地到沿海，从农村到城市，特别是沿海的特大城市群集中为趋势。因此，伴随着中国过去 20 多年特别是在 2000 年人口迁移的是城镇化加速。尽管城镇化水平在中国曾经有不同的定义，以最新的统一标准划分城镇化水平，居住在城镇（现居住地）的人口在 1990 年时占全国人口的 26.2%，2000 年达到 36.9%，而 2010 年更达到 49.7% (Wu and He, 2015)。国家“十二五”规划更进一步把推动城镇化正式摆上了政策议程，以期城镇化，特别是城市化成为刺激内需、引领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的城镇化主要表现在一些大都会地区（北京、上海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福建等）的人口的持续增长上，而这些地区恰恰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城市长期以来以“单位制”为基础的资源（再）分配体制和社会控制体制逐渐瓦解 (Wu, 2013)。

社会管理的重心开始逐步由“条”转向“块”、由“单位”转向居住的社区（Wu, 2011）。随着城市化、劳动力自由流动和住房商品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居住社区以居住者社会经济地位为主轴的分化亦日渐显现。社区间的差异在扩大，异质性不断增强。而社区内部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同质性相对来说也有所增强。换句话说，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居民会生活在城市中的不同社区。如外来农民工游离于特大城市各种管理体系外，集中居住在城郊接合部，而新兴的城市中产阶层则主要集中居住在商品房小区。如何有针对性地配置公共资源，满足居民需求，需要特别关注社区居住格局、居民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等在空间分布上的关系，把基层社区间的差异化的描述和刻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社区”因此成为中国创新社会管理、实现社会善治、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场域。

事实上，“社区”这个概念在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社会学这门学科正是诞生于19世纪末那场巨大的社会转型对Gemeinschaft（Community）社会结构和纽带的破坏（滕尼斯，2010）。经典社会学家，如涂尔干、韦伯、齐美尔，都对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传统社会关系纽带的衰落表示出极大的关注。20世纪美国学者沃尔斯对芝加哥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主义（urbanism），城市的人口规模、密度，以及种族的异质性等，加上社会关系的匿名性（anonymous）、表面性（superficial）、暂时性（transitory）导致社区的衰落和社会解组（social disorganization）的发生，对城市社会治理提出了很大的挑战（Wirth, 1938）。因此，西方学者们在研究当代城市社会问题的时候，也呼吁对社区的回归，对邻里关系和社会资本的重视。如科尔曼正是基于对家庭—邻里关系对儿童学业成绩影响的经验研究而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著名的社会学概念（Coleman, 1988）。

城市研究中早年兴起的“芝加哥学派”以及后来居上的“洛杉矶学派”，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中国快速变迁的城市，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天然实验室。都市中国的兴起，呼唤着基于中国经验的都市研究和城市社会学。当代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依赖高质量的数据搜集和经验分析。过去10年中国国内各大高校都纷纷建立自己的专业调查与数据中心，以社会学/抽样调查的专业优势，搭建跨学科的数据建设平台。例如，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RSC）的“中国综合社

会调查”（CGSS）、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等。这些项目，大多是全国性的，研究设计和题目要顾及方方面面，特色不突出。样本的限制，使得数据分析难有针对性，研究结果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还有待加强。此外，如何连接花费大量精力和金钱收集来的抽样调查资料和越来越多的非调查取得的行政数据、网络数据等，上述项目还缺乏前瞻性的思考和研究思路。抽样社会调查、数据搜集和实证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如何面对即将来临的“大数据”时代的挑战，我们还没有危机性的思考。

“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SUNS）立足上海现代化大都市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管理，以城市追踪调查为核心，旨在建立一个包含社区、家庭和个人的多层次的综合追踪调查数据库；以社会学传统学科优势为依托，整合经济学、传播学、统计学、环境科学等跨学科都市研究力量；以社会科学抽样调查为基础，利用大数据时代的新数据搜集与数据整合手段，产生新的学术生长点，建立学术发展新范式；以大数据社会分析为基础，提高社会科学参与民生政策和基层治理的研究水平；以上海为研究重点，推进国际、国内的都市比较研究。通过项目、团队和研究成果，形成社会科学都市研究的一个新范式（制度-空间分析）。

本章首先对国际、国内关于邻里街区（社区）的研究进行梳理，然后介绍 SUNS 的设计理念及与其他类似的项目相比较的特色，接着介绍项目的执行状况，最后展望利用 SUNS 数据分析的一系列可能的研究课题。

二 街区效应的研究综述

尽管城市社会学中对空间因素的关注可以追溯到早期社会统计学家在欧洲的一些经验研究，但真正使“社会-生态学”分析在城市研究中登堂入室者，始于罗伯特·帕克和欧内斯特·博吉斯合著的《社会学科学导论》一书（Park and Burgess, 1921）。两位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先驱以在 100 多年前美国工业化过程中崛起的中部大城市芝加哥为例，对不平等与贫困、犯罪和越轨，甚至健康等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强调城市中社会分化呈现的空间性，将以邻里街区为中心（neighborhood-centered）的研究带入了学科的前沿。他们认为，城市化、工业化和社会

变迁反映在社区层次上，是社会解组，即个人关系、自愿团体和地方机构遭到破坏，削弱了社会化和社会控制必需的基础，从而最终导致种种社会问题的出现。芝加哥学派对后来美国社会学中依然流行的邻里街区效应研究的影响，体现在他们对空间特征的强调，对街区层次的结构分化和社会现象空间积聚的关注，以及空间因素对个体行为影响的社会机制与过程（Sampson, 1991）。

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社会-生态学视角在“二战”之后一度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批评与挑战。一是来自方法论视角的批评。罗宾逊认为，个体层次现象之间的关系不能由汇总或生态层次（如社区或邻里）的相关关系来推断，否则就要犯“生态学谬误”（ecological fallacy）。例如，在州层次上外国出生比例的人口与识字率呈正相关关系，但在个体层次上则是负相关关系（Robinson, 1950）。当然，芝加哥学派反驳认为，罗宾逊认为他们仅仅关心个人层次的差异，但是他们分析的却是社区层次上的比例（率）的差异。只要说清楚分析单位的层次，适当地界定问题的分析框架，即可避免“生态学谬误”。正是因为要避免这种指责，后来继续承袭芝加哥学派传统的经验研究，主要基于人口普查小区数据，并且大多停留在对美国各大城市的社区层面分化现状和趋势的描述（例如种族之间的居住隔离）。二是来自理论视角的批评。芝加哥学派视社区为一个有土地使用、人口和住房竞争、互动和适应的自然区域。以罗根和莫洛奇为代表的“关于地域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学派认为，美国城市里街区（neighborhood）之间的分化和不平等，并不是个人偏好和自愿迁移的结果，而是因为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资本积累和城市“增长机器”（growth machine）逻辑的影响。国家、政府、商家以及其他更加广泛的政治经济主体都可能影响我们对社区能够和不能够做什么的理解。在当今这个相互联系日益加强的社会，社区相对个人来说或许并未丧失其分析的价值，但其作用更加复杂，因情景而变（Logan and Molotch, 1987）。因此研究者要对社区之外更大的社会秩序联结的内部和外部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

在以街区为基础的城市研究的社会生态学派广受批评的同时，威尔逊在其名著《真正的穷人》（*The Truly Disadvantaged*）中承袭了芝加哥学派对空间研究的视角，对城市贫困的积聚效应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并将这种积聚过程与更加广泛的宏观经济结构变迁联系在一起。贫困、失业集中在内城，而那里正是低收入少数族裔（黑人）的聚居区（Wilson，

1987)。麦西和登腾在《美国的种族隔离》(*American Apartheid*)一书中继续阐发了威尔逊的这一思路,不过重点关注种族隔离的后果,描述了由经济转型带来的社会日益分化如何与少数族裔群体的空间聚集发生交互作用,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结构条件,进一步强化了这些群体在社会经济方面的不利地位(Massey and Denton, 1993)。尽管在因果解释机制上有所不同,这两本书都非常强调街区的空间效应,因此在生态学派一度受到来自政治经济学派的批评之后,重新将以街区为基础的研究带到了社会学研究的前沿。

在上述两本著作发表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关于街区效应的经验研究的文献数量迅速增长。根据桑普森的总结,这些研究达成四点共识:一是城市中各街区间存在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地位与种族隔离方面;二是这些因素相互联系,因为它们与少数族裔或移民的空间隔离是重合的;三是一系列与犯罪或健康相关的问题经常在街区层次发生,且可以用贫困的集中度、种族隔离、单亲家庭比例等街区特征来预测;四是一系列描述社会进步的指标,如富裕家庭,懂计算机知识的人,还有精英职业的获得等,也在空间上具有集中性(Sampson, 2012)。

这些结果看似直截了当,没有争议,其理论含义则不然。一种看法沿袭芝加哥学派的传统,认为如果街区的影响不是单纯地反映个人特征,那么他们一定来源于超越个人层次的社会互动和制度过程。而另外一些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则完全回归到对社会现象的个人层次解释,强调因果推论和选择性偏误,认为我们所观察到的街区效应主要是个人和家庭自我选择所居住的街区带来的结果,而这种选择是个人/家庭层次上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前者以芝加哥街区人类发展项目(Project on Human Development in Chicago Neighborhood, PHDCN)和桑普森所著《伟大的美国城市:芝加哥和持久的邻里效应》(*Great American City: Chicago and Enduring Neighborhood Effect*)为代表。他们致力于探究社会过程与社会机制来解释街区效应的存在,认为街区层次的多元行动主体(如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社会网络,地方精英等)和街区之外的力量超越于简单的个人层次特征的汇总,在社会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后者则以洛杉矶家庭与街区调查(Los Angeles Family and Neighborhood Survey, L. A. FANS)项目为代表,研究街区、家庭和同伴群体对儿童成长的影响时,特别强调居住流动和街区变迁的过程的作用(Bruch &

Mare, 2006), 也关注社会福利改革项目对街区层次的影响。而探究街区因果关系的最著名的项目, 就是美国联邦政府住房部实施的名为“移向机会”(Moving to Opportunity, MTO) 的住房政策实验。MTO 随机将住房补贴券分发给贫困家庭, 以诱导一些家庭迁移到贫困率比较低的街区, 准确无误地估计街区的因果效应 (Briggs et al., 2010)。这种实验法的研究设计, 在寻找因果效应方面固然有其严谨的逻辑, 但却无助于理解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逐渐发展的街区层面的现象及更加宏观层次的社会过程。

概而言之, 城市社会学中街区效应的研究, 在方法论和实质研究问题方面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内, 取得了以下几项进展。第一, 多层次模型 (multi-level model) 的发展, 使得分析街区层面的现象和个体层次的行为后果之间有了有机的连接, 避免了罗宾逊所批评的“生态学谬误”。第二, 研究街区效应更依赖于个体—家庭层次的微观数据 (如 PHDCN 和 LAFANS 项目), 更加注重个体层面的因果关系的解释, 体现在研究设计中, 便是个体—家庭—街区多层次追踪数据的搜集和分析, 并与行政数据 (人口普查) 的分析结合。第三, 关于街区层次现象和制度过程的研究, 也同样受到关注, 并且吸收了政治经济学派对芝加哥生态学派的批评, 更加关注街区层次的社会现象与更大背景的宏观制度结构和过程间的关系。第四, 关于街区的研究毫无例外地与不平等和贫困、移民、犯罪等城市治理中的典型问题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 越来越具有公共政策的导向性。

三 中国的街区效应研究

西方城市社会学文献中的“街区”(neighborhood) 这一概念, 在中国城市情境常常被叫作“社区”(community)。社区这一概念, 最初是燕京大学学生在 1933 年介绍美国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帕克的社会学时, 用来翻译英文“Community”一词的。它包括“社”和“区”两方面的属性, 即指以地区为范围, 人们在地缘基础上 (“区”) 结成的互助合作的群体 (“社”), 用以区别在血缘基础上形成的互助合作的亲属群体。地缘群体最基本的是邻里 (neighborhood), 是指比邻而居的互助合作的群体。现代城市中社会关系的匿名性、表面性、暂时性, 导致“社区”这个概念中“社”的属性弱化, 即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主义导致社区的衰落 (Wirth, 1938)。如上所述, 西方城市社会学中关于街区效应的大量经验